

传奇
有历史的就有

《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结集

共和国记忆

李菁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共和国记忆

李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记忆 / 李菁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0

(有历史就有传奇)

ISBN 978-7-5060-7805-4

I. ①共…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5758 号

**共和国记忆
(GONGHEGUO JIYI)**

作 者: 李 菁

产品经理: 刘晓立

责任编辑: 杨 颖 刘晓立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7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805-4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3



目录

CONTENTS

面孔

红墙医生：我眼中的毛泽东	2
西花厅岁月：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15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36
“军神”刘伯承片断	57
陈毅的五种身份	90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117
传奇陈赓	153
“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182

往事

毛岸英之死	214
魂断大漠：我亲历的“九一三”	228
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	244
基辛格的“波罗行动”	264
1972，尼克松：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292
1979，美国的邓小平旋风	324

面孔





红墙医生：我眼中的毛泽东

口述人：王鹤滨

遥不可及的红墙，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一代伟人毛泽东，则无疑是外界种种传奇想象中的主角。而对于曾在那里工作过四年、与毛泽东有过“零距离接触”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来说，这些神秘，不过是种种平凡而鲜活的记忆构成的真切回忆。

在北京甘家口附近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已近 90 高龄的王鹤滨老人正和家人安静地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身边的这位普通老人，曾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首位保健医生。在主席身边四年多，他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初见主席

1943 年，我还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9 月的一天，

我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忽然看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柳树店的山沟，停在礼堂前的空地上。当一个身影从车上走下时，离得最近的几名同学一下子认出来人是谁，立即响起一阵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铛、铛、铛……”学校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我们整队到大礼堂前听毛主席讲话。我们一共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带着草垫子，有的带着小板凳什么的，很快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当毛主席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随着掌声一齐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主席前面就是一个小桌子搭的讲台，警卫员给他倒一杯茶放在那儿，我坐在第一排，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桌子。毛主席穿着一身旧军装，裤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补丁，十分显眼。这种战士装束，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他微笑着举起双手，手心向下轻轻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主席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全场所有同学的心，大家都屏息静听着他的演讲。“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主席非常善于演讲，他思维清晰，中间不断抛出问题，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的枪从哪里来？”他问。

“兵工厂。”大家在底下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我们的兵工厂在哪？”稍顿片刻，主席自问自答：“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的兵工厂在南京呢。”

“我们的工厂在南京，那怎么运来呢？”他的一问让大家又陷入沉思。

“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运来的。”大家恍然大悟，哄堂大笑。

主席又说：“这个运输大队长很负责，他运的枪炮我们都收到

了，但不给他打收条。”主席话音一落，全场立即发出了阵阵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学校也下了山。那时军委卫生部刚成立，到学校挑选两名学生，我被挑上了，来到了中央门诊部，成了这里唯一的眼科医生。

1946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给毛主席检查眼睛。一大早，我手提工具箱，跟在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后面，到了主席驻地所在的王家坪。当时江青正在窑洞外散步，她个子很高，长得很清秀，在延安那些女同志当中显得很突出。江青比较爱美，虽然她和大家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但她在腰上束着腰带，一下子把腰显了出来。她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鞋尖上还各系着一个粉红色的毛绒线头，像京剧里的刀马旦。那时候，江青也不担任什么职务，大家对她除了有几分好奇之外，也没什么不好的评价。

毛主席正在窑洞里忙着看文件，身上仍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显得有些疲倦。傅连暲笔直地站在主席前，用较低而平缓的语音向主席报告了来意，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主席并不知道我要来，傅连暲怕事先告诉他，被他拒绝，所以只好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主席也只好同意。他一边接受检查，还一边看桌上的文件。

检查时，只有五六岁的李讷（注：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从寝室跑出来，抱着主席的腿喊“爸爸”，主席见到她很高兴，表情放松了很多。邓子恢走了进来，摸着小李讷的头说：“哟，我们的小公主，长大了谁敢娶你呢？”那个场景，就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就是我前两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主席的保健医生，更近距离地走近伟人。



毛泽东与毛岸英

走进“红墙”

1949年3月，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北京城，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说：“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让我跟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又激动又紧张。罗道让鼓励我一番，然后让我进城，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那里报到。

傅连暲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我一进门，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他又叮嘱了我一番，最后说：“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听他一番话，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傅连暲语气沉重起来：“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傅连暲平静下来后，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宴会很多，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谁能不兴奋？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国宴开始前，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我“被逼无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同志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几瓶“特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然后把这些“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他喝了我们的“特制酒”后，马上明白了什么，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微微一笑。我正得意呢，忽然看见他又端着“茅台”向一位苏联“老大哥”敬酒，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非要喝换杯酒，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马上皱了眉头，双手一摊，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可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怕被识破，赶紧给“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这才化解了“危机”。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后，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扫了一眼，然后看看周围的客人，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对他耳

语了几句，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算是谅解了。而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察觉，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这样，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傅连暲对我说：“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所以，在任弼时病故之前，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

有一天，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一看林彪同志，他长期身体不好，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傅连暲带着我去林家住宅，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进林彪的卧室，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林彪蜷缩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仿佛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感谢毛主席。”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我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卧室贴纸条，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如果他感到有风，就马上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烧。当时他正在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之后，都会开一个处方，林彪逐一审看每一个专家的处方，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因为林彪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林彪的病，心理因素究竟占了多大成分？

平凡岁月

有人问我：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我的回答是：主席非凡的精力。

主席习惯于晚上办公，下午3点左右是主席一天工作的开始时间。有一次，主席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也横下一条心，想这天晚上就舍命陪君子一回。

主席在那里办公，我就在旁边坐着看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我们都没说什么。但我看着看着眼前就开始模糊了，我想，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我就困了。于是我就拿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怎么拧也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恍惚中感觉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暖烘烘的。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是他给我盖在身上了。看到我醒了，主席冲我点点头，我很是羞愧，本来想看看有什么空隙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我自己先睡着了。

主席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一半用来睡人，他和书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他床上的那些书多是线装的，看过的书几乎都夹着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主席自己写的铅笔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主席的书是千万不能碰的，主席对书特别有感情，夏天，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总是拿着书看，外出的时候也总带着书。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三年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也没看到过有何祝寿的活动。1952年12月26日，主席睡醒后，让值班警卫把我叫去陪他吃饭，和往日一样，餐桌上摆了酱菜、辣椒、腐乳等，还有一碟酱牛肉，餐桌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还有一蛊斟好的葡萄酒。

主席从起居室里走过来，照例用手势招呼我坐在他的一旁，

然后举起那一蛊葡萄酒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赶紧站了起来，说：“祝主席长寿！”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吃面条汤可以吧？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什么活万岁的？”

我想起几天前，在办公室门口碰到叶子龙，他正向主席请示，问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主席不假思索地回答：“收下来，都不见报。”“如果人家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发表他们的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主席又叮嘱了叶子龙一句。主席的 59 岁生日，就是这样过的。

1953 年夏的一天，主席叫我过去，问我把他的伙食费用开支压下来多少，之前主席已跟我说过三次，但我都没有执行。他来做我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我和杨开慧，还有一个孩子（指毛岸英），加上保姆，一家四口，每个月还有节余。那时官没现在大，现在花这么多钱不应该。”我的身份是中央办公厅任命的主席秘书兼医务室主任，我只好布置下去，从让孩子们定时、定量吃水果开始。

压缩开支第一步还没开始，第二天我一上班便看到江青站在院子里等我，一看到我她就问：“吃水果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吃？”我向江青解释一番，但她还是坚决地说：“不行！”因为生气，声音都有些发抖。这一天，中办主任杨尚昆来毛主席这儿汇报工作，我赶紧向他汇报了这一风波。杨尚昆想了一下说：“鹤滨同志，主席的伙食标准不要再往下压了，有亏空我来补。”我后来才知道中央也有困难户，有一次杨尚昆来找主席，说小平同志孩子多，生活有困难。主席说：“那就救济救济，给他点补助吧！”

江青当时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不怎么上班，那时还比较随和，我们都喊她“江青同志”。她有时喜欢打牌，汪东兴、叶子

龙和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陪她玩，她喜欢和罗光禄搭档，罗光禄人很老实，玩牌也很认真，怕人家偷看他的牌，每次都把牌捏得紧紧的。他们赢的话，江青就高兴地哈哈大笑，喊“罗子”。

有一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江青住的松寿斋。我去的时候主席在睡觉，我就转到南院去看江青。她正在听手摇留声机，这种东西比较少见，所以我印象很深。留声机里正在放：“王老五，命运苦，衣服破，没人补……”我知道她过去演过戏，不知道她是否在回忆以前的岁月。

有一次江青从苏联疗养回来，可能怕干扰主席休养，有一天躲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照片，看见我去，就喊我一起看照片。照片上她穿着件白衣服，草坪后面是一大片橡树，江青说：“是我设计好的，让别人按快门。”我想她可能受俄罗斯传统油画的影响，才这样设计的吧。我由衷地称赞说：“真漂亮！”江青听了特别高兴。

有一次黄敬从前门大院里走过，江青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他叫黄敬，年轻时还挺漂亮的，现在胖得不像样。”我们后来跟主席去天津视察过两次，主席还到黄敬的家里看望过他。因为黄敬生病，是他夫人接待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江青在年轻时曾同黄敬有过恋爱关系，只是感觉江青的语气也很轻松，没有什么怨恨的味道。

毛家的孩子们

我见过毛主席的四个孩子，他们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 1946 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

着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戴着黑色的礼帽，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我好奇地问护士，这两人是谁。护士说，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肤色白一些、方脸盘的是毛岸英，黑一点的、鸭蛋脸的是毛岸青。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我受命给毛岸英检查眼睛。他此时的装束，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岸英的眼睛有些近视。查完后，岸英说：“来之前，以为你是个老头，苏联医生都是大胡子，你这么年轻就当医生了，真羡慕你！”岸英的汉语说得很好，只是稍带一点点口吃，可能与长期不说汉语有关。

1946年秋，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2月，过春节，大家组织开联欢会。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孙维世嘴有些大，但长得很漂亮。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男青年的舞蹈，蹲下、跳起来、伸出腿，但在广场的空地上，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晚上，他们在广场上借着星光，把手一举，跳起踢踏舞，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

1948年，我们又到了河北平山县，都在中灶食堂吃饭。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何理良（注：黄华夫人）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一天，不知毛岸英说了一句什么话，引得于光远、何理良哈哈大笑，毛岸英停下吃饭的动作，把筷子往碗里一插，看着他们笑，然后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他这样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于光远向他解释：“你没说错话，但你说的不伦不类。”原来毛岸英跟着他们学习古汉语，毛岸英一听，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1950年的一天，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看见我说：“岸英牺牲，主席还不知道此事，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我一下子也震惊了……没过几天，我



毛岸青

到菊香书屋院里时，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很沉痛地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翻译得不好，问叶子龙，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迫不得已，叶子龙才向主席通报了此事，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

毛岸青到了北京后，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扫大街。

毛岸青只比哥哥小一岁。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刚要离开，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语气低沉地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时而与这个“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小家伙”和好，谈谈笑笑。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往湖里跳。我跟他谈，他说：“我脑袋里有个‘小家伙’，我一走到湖边，他